

更好地找到自我,或者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关于长篇小说《泱泱》的对话

□王玉珏 宗晴



宗晴:我看过一个有关您的采访,谈到了《泱泱》是一部必然要写出来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王玉珏:构思的时间不算,2020年春节前后,真正从在电脑上落下第一个字开始算起,整部小说写完,大概花了半年多时间。生活到哪儿,写作就到哪儿,其他作家不知道,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呢?如果它仍然有得可写。《泱泱》里的场域涉及乡镇、北京、机关,基本上与我这些年的生活半径吻合,里面的人物大多也是我生活中的、身边的人物,有些甚至都有原型。

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或者说之所以写出了这些作品而没有写出别的,决定因素一个是他的阅读,另一个就是他本人的经历和生活。在我看来,完全脱离了个人经验和个人经历的虚构,是可疑的。

宗晴:《泱泱》主要是以农村与北京为背景,这与我们所说的城乡一体化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是从村到县城,这里是直接以首都作为城市的代表,这样写是因为您对北京有个人情结还是为了找两个对比鲜明的事物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王玉珏:这里说的“城乡一体化”更多的还是指小说的背景层面。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好是与我们80后这一代人的青春同步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于农村的这代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和心理上割除了他们与土地之间的脐带。没有了这根脐带,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变成了一种义无反顾,同时也是一种别无选择。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留下来反而成了非常态,需要勇气、坚守和定力,这一点在窦明亮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再一个,城市所代表的,毕竟是更有希望、更有活力、更加美好的一方,它天然地吸引着年轻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不让自己的下一代拥有更多的希望、活力和美好。

小说里之所以选择了北京作为城市的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代表了城市的顶层和终端,它太高,难以企及与真正融入,窦明

翰、陈东城、窦明亮三个人虽然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其实没有一个能真正抵达它,在北京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窦明翰的回归、陈东城的跌落,以及窦明亮的清醒,其实也都是根源于此。

宗晴:《泱泱》在结构上不是以线性叙事,而是将三个人的故事打乱重组,也留下了许多空白,这样写是为了让文本达到更具文学性,少一些纪实性的效果吗?

王玉珏:对,《泱泱》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这三维分别是时间、空间、人物。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即第一章;第二个维度是空间,即第二章、第三章;第三个维度是人物,即第四至第六章。我平时写作很少有列提纲的习惯,但这次就不行,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了什么事,都必须严格按照精准地切割好,然后放进不同的抽屉里,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人物生平表。效果还不错,三个人物契合得更加紧密,整体结构上也更加浑然一体。结构上的不自由反而带来了叙事上的自由,这是个辩证。

宗晴:在《泱泱》中,提到了过年时农村的现象:“平常不明显,一到年上就见了高低了,是骡子是马,在年上拉出来遛遛。”我对这一场景格外亲切。村里面最热闹的时候是过年,人多当然八卦也多,人们闲聊时也是各自聊各自在外的经历,顺便看看哪里挣钱,等来年了一起去干。我们常说,没有

比较就没有伤害,那么您是怎么看待农村人这种普遍心理的?

王玉珏:流动和比较是好事。从社会学角度看,一种公正的制度核心原则应该是允许流动、鼓励竞争,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家在城里不觉得,过年都回到了村里,聚在一起,互相之间当然会一比、看一看。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激情和动力,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生活未定,未来仍然可期。

宗晴:相对于范红月等,宋让芬这个人物让人眼前一亮,她可以说是一个“反叛者”,不被传统观念束缚,也不被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影响,坚守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则。您是怎么想到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

王玉珏:首先是小说叙述的需要。宋让芬这个人是在窦明翰体内的“病毒”,作为母亲,她的“反叛”以及对城市的那种强烈的、非常规的向往和渴望,其实是成年之后的窦明翰对城市,对姜枢眉以及姜枢眉一家,乃至以庞总为代表的北京所有复杂心态的源头。耻辱也好,自卑也罢,窦明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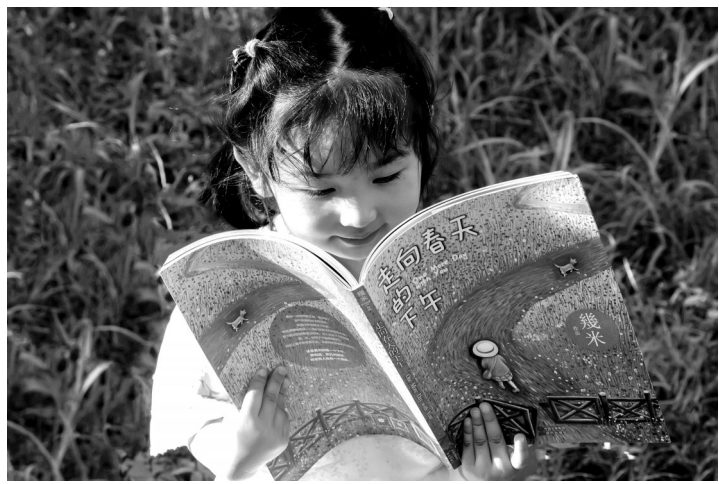
后来的每一次选择,其实多多少少都与这“病毒”有关。

其次,从人物本身来说,宋让芬对于城市的向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召唤和需要,一种本能的精神欲望。所以说,宋让芬后来对来自城市的儿媳姜枢眉的喜欢,也是发自内心的与本能的,是剥离了世俗、功利因素,最原始、最童心、最本真的“喜欢”,就像小说里写的,“长长的跋涉”“满心欢喜的旅程”“一个欢天喜地心无旁骛的孩子”。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选择了永远留在农村,这一意外和反转其实也并不难理解:遥望、想象与封存,有时比置身其中更令人神往与心安。

宗晴:您为什么会从事写作呢?您认为社会责任感在创作过程中是必需的?

王玉珏:短篇小说的精致,与长篇小说的恢弘一样,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我希望《泱泱》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我来说,写作可以对抗个人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解决我灵魂方面的问题。文学最大的功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更好地找到自我,或者说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无论写与读。还是那句话,它是属于灵魂范畴的。

随手拍·悦读



李凌霄 摄影

《村庄令》里催人泪下的广阔人生

魏振强老师的《村庄令》,我拜读了一个月,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

现在,魏老师的外婆,已经成为了我的外婆,外婆挣工分,外婆做米糖,外婆打水、种地、晒粮食、跋山涉水地去看自己的小女儿,养活着小外孙,还要接济大女儿一家几口,外婆就像神灵一样强大,像女媧一样能干,像地母一样宽阔仁厚。大饥荒年代,饿殍满地,外婆家丧失了两个顶梁柱,外婆活下来,还养大了女儿们,接着养外孙,这要有多么坚韧强大的心理能量啊,在物质过于丰腴而精神逐渐衰弱的现代人眼里,简直不可想象。

而魏老师的妈妈,

儿,孩子穿上这样有艺术感的衣服,也扬眉吐气起来。之所以被村里人一直亲切地称呼为“大姑娘”,除了情感原因,也肯定是因为妈妈有着过人的灵性、才干和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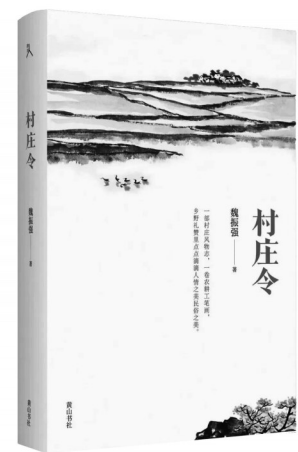
看着这些故事,有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受,魏老师的文字淡淡的,但是极富穿透力,最高级的作家,一句话,几个字,就已然令人一眼破防,因为他表达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每一代人都有着每一代人的痛苦和哀伤,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救赎,而魏老师笔下的这些关于村庄的故事,则有着同年代无可比拟的力量,就是因为感情是无法比拟的,这些承载着深情厚谊的情感自有着一种“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的古典美,几句话就已经千言万语,几千字就写尽了人世间的千山万水。

令人震惊的是,从时间的维度上看,这件事其实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几十年时间,但这几十年里,人性、人的感受,人与人的联接,已经天翻地覆,几十年前的生活是粗粝的,但人情是细腻深厚的,在时代飞速向前,一切细腻的感受,一切崇高、优美、深厚的表达都急剧消失的今天,人们的感情变得迟钝且功利,幸而还有《村庄令》这本书,有大司村的这些人物,来洗涤我粗糙的灵魂。书记记录下他们承受的生死离别,记录下他们的悲欢离合,在飞速奔跑、飞速丢弃的年代,这些故事唤出来很多眼泪,也唤醒了多少情感。

在写小姨娘的那一篇里,魏老师写到小姨娘的两场哭,“我知道有些哭声是挡不住的,不如让它泄出去。我就那样听着,听到后来,竟然有些麻木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句话说‘每个成年人都是一场劫后余生’,我们听着别人的故事,也为自己的人生默默哀伤,那些挡不住的哭声,还有那些挡不住的命运,只能麻木地看着它们滚滚而来,隆隆而过,任它们碾碎一部分生活,然后捡起那块带着残缺的生活,咬着牙住下过。但这住后的路,肯定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会觉得一些东西可以放下,轻装前行,而另

一些东西,比如岁月里积淀下来真挚的情感,像珍珠一样,被心亮的人捡起来,擦干净,揣在怀里抱得更紧了。

在我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屏幕上跳出来一个AI写作的广告,从前总是听说AI会淘汰作家,我笑了,怎么可能,什么样的AI也淘汰不了有着真诚的、丰富的生命体验的作家,就像魏老师写的大司村,谁也替代不了他的感受,再智能的机器人,也写不出这种催人泪下的广阔人生!这些文字里有着深如海、重如山的深情,得到和有幸付出这样深情的人,没有白来世间一遭。



□肖逸

也成了我的妈妈——发洪水了,爸爸把哥哥和我“丢”进盆子,妈妈把弟弟递给爸爸的时候手一滑,弟弟掉了,妈妈本能地用腿夹住了弟弟,否则弟弟就被洪水卷走了。外婆躺在床上不得动弹,妈妈带着小姨娘冒死去“偷”了几棵麦子,一家人因为这点麦子活了下来……这些故事都惊心动魄,感慨的是,在生死关头下,妈妈做出的本能反应,救了外婆,救了弟弟。人群中总有一些人,是特别有灵性的,就像妈妈这样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老虎或者兰花菊花牡丹的“真身”,从挂历上看一眼,就能够过目不忘,把它们绣成花样

阅读《人民教育》2023年第1期,有篇文章《学校教学管理要体现“动态综合”的理念》,读了之后有所触动。这是一则书评,介绍的是《走向新时代的教学管理》一书,作者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用七章内容道出了教学管理的真谛:管理无小事,处处是智慧。结合走访学校时的思悟,我觉得确实如此。

车棚里面车子怎样摆放整齐?学校一百多位教职工,出于服务、方便教师,在教学楼后建成了一个车子棚,并且安装了智能充电器,还用醒目的标语提出要求:“锁好爱车,摆放整齐。”可偏偏是如此景象:一是离校门近的车子拥挤在一块儿,甚至放出车棚外,把一部分墙体标语都遮住了,离校门远端的车棚,还有空位没有排满。二是由于拥挤的这一端车子过多,就有一些电动车横斜放置,不能与整体的顺序保持一致。那么,“摆放整齐”的这个要求只是墙上的标语,而没有落地落实到教职工的行为上。想一想,为什么放不整齐?可以想象,有一部分教师是匆匆到学校来的,赶紧把车子放下就走了,所以哪里近就放哪里,也顾不得不是整齐了。再想一想,为什么不一定要放整齐呢?放乱点不行吗?首先,整齐有序的面貌好;其次,井井有条展现的是管理的精细化程度高;还有,教师的风纪律时时处处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摆放整齐呢?这恰恰就是考验学校管理者智慧的地方。办法肯定有,那得开动脑筋去想去做。

梅花与苔花“朵朵都精彩”。这是秋季开学的时候,学校规模不大,新生有六七十名,在学校门口设置了两块大展板,画了两幅图画。画面上有苍劲虬曲的梅树,有巍峨壮丽的山峰,有蜿蜒流淌的河流。走近了看,每一朵梅花、每一块绿苔都有一个名字——是所有人学新生的姓名,红红的、绿绿的,绽放光彩,煞是好看,取意于“梅花香自苦寒来”和“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可以想象,这些学生以及家长看见这幅画时洋溢喜悦的神情。据校长讲,他们学校处于城乡接合部,学生来自农村居多,还有不少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所以用这幅画就是想传递给孩子们一种意识或者是文化因子,走进这所学校,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梅花与苔花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绽放,“朵朵都精彩”。小小举动、用心创意、满满温暖,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不就包含在这些看似平凡普通的事情当中了吗?

你们幼儿园向家长开放视频监控吗?有一位家长朋友曾对我

管理无小事
细节见精神

□张长恒

说,他家二宝在一所民办幼儿园上学,这个幼儿园向家长开放视频监控,家长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看到孩子在幼儿园里的情况。他感觉这个做法很好。我把这个问题拿来问另外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办园历史较长,业内口碑很好。园长坦率地说,她知道有的幼儿园这样做,并且以此来吸引家长、招揽生源,她们园也曾考虑过这件事,但经过讨论达成共识,此举弊大于利,不能向家长开放视频监控。她说,看似有利于家长了解掌握孩子在园情况,满足了他们的关爱子女的殷切之心,但其实至少有三个弊端:第一,放大了家长和幼儿园老师之间的不信任,似乎只有通过视频监控才能够放心;第二,增加了幼儿园迎合家长的倾向性,办园容易失去“自我”;第三,提高了家长们更为焦虑的可能性,“纤毫毕现”“一览无余”之下,比较、挑剔、干预、纠纷等会更多地存在。办学有主见,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遵循教育规律的常识,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一种负责任、敢担当的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勇气。

有人曾说:“阅读犹如一日三餐,天长日久,终会内化在一个人精神面貌里,终会助力于一个人的心灵成长。”教育征途漫漫,唯有读书、思考、践行,以自身成长推动我们从事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好,不亦人生一大乐事幸事乎?

混合交响 意蕴丰厚

——六幕舞台剧《红石岗》观后

□高军



了记者君红和爷爷的穿插解说,六幕舞台剧就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剧作充分调动各种因素,各要素之间体现出很强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讲究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成有机整体。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超出单一因素的简单相加,发挥出更大的功能。创作人员从大量素材中细致梳理故事的脉络,力求用更精准的话讲述来展示,让六个故事的结构好似一串用心串成的冰糖葫芦,以一连串并不相关的故事构成戏剧场次,尽管全剧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但以两个人物为主线,从容地驾驭众多人物,驾驭六个场次,以六组人物展示风云变幻的缩影,带动其观众的情感波澜。第一幕“初心红日”展现的是党领导沂蒙山区开展抗日斗争的时代背景,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沂蒙山区的抗战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血染战报”是支持报社的故事,“红旗飘飘”是党员群众保护党旗的故事,“赤心若克”则直面八路军战士陈若克的斗争和牺牲,“岗上红云”是沂蒙人民和敌人机智勇敢地殊死搏斗,“生死相守”是沂蒙红嫂救伤员和八路军战士复员回来陪伴兰嫂母亲的故事。但整套戏剧并不单纯是山植和冰糖味道的简单混杂组合和机械叠加,而是出现了六者合作共存的状态,出现了六个一相加大于六的协同效应。如单论第一幕“初心红日”体现党在沂蒙山区的领导地位;第五幕“岗上红云”表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沂蒙人们觉悟不断提高,斗争精神越砺越强。但这两幕结合在一

起看,还能看出更多的内涵,如民族大义、党群同心、军民情深、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等。单看第六幕“生死相守”也不单是沂蒙红嫂救伤员和报恩所能概括的,至少还有风雨如晦年代沂蒙人民心怀坚定信仰和民族大义的内涵等。再如第四幕“赤心若克”中,陈若克女儿出生后因为没有奶水,饥饿得发出撕裂人心的哭声,敌人用热乎乎的牛奶来引诱陈若克签字声明放弃革命信仰,陈若克看牛奶的眼光中也有一丝渴望,但随即就坚定地拒绝了,这两个细节的组合也是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除了母亲对孩子的爱、对敌人的恨,更有人性深处的复杂以及压抑人性本能体现出来的坚定的信仰和更大的爱等。细节的整体性是全部细节系统成立的基础,是更大内涵得以存在和演进的前提。第五幕“岗上红云”中,武善同在群众将被屠杀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诱骗日军至村外小岗子顶,趁敌不备拽两敌兵纵身跳崖,同归于尽。他从想在群众中隐蔽到大义凛然承认自己是党员干部,表面看是两个层次,但组合在一起,层与层之间就有了广泛的联系,产生了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同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有一条暗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剧中,系统由要素组成,但不总是要素的简单集合。可以这样说,创作人员精心选择的六个发生在沂蒙山区的真实故事,就像六根笔直挺立的柱子协同发力诠释和展现了沂蒙精神的丰富内涵,支撑起了对沂蒙精神的生动演绎。思想的传递更深刻,艺术展现显得更完美。